

“后现代”死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中心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0月8日至9日在上海举行，来自英国、俄罗斯、日本和国内的专家近60人出席了研讨会。

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默多克（Graham Murdock）分析了“当代消费文化及其矛盾”。他指出：热心于体系研究的人往往着眼于市场交换，看到个人选择和自由的范围。而马克思则突出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和强化生产的剥削性关系。这种全新的商品文化在合法的和再生产的资本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这种复杂性的确引起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与阿多诺、霍克海默有关联的本杰明和文塔尔的重视。二战以后，当西欧第一次走向全面的商品文化之时，新一代学者开始回到这个主题上来。默多克认为商品文化已经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的文化中心，为此他建议我们最好重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中对商品的初始分析。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考虑晚近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矛盾并聚焦于以下三个矛盾：（1）“进步”的目标和风险的普遍化；（2）网络交往中的紧张状态；（3）世界公民结构的出现。默多克指出：围绕商品和消费主义的争论——有关它们的含义、承诺和社会经济成本——都集中在了正在形成中的对全球化消费资本主义抵抗形式的关注上面。也正是通过对商品的分析，能够把紧密包裹着广告和商品的闪亮外壳的资本主义关系再次揭开。针对我国学术界对于现代、后现代等概念的纠缠，默多克直截了当地指出，“后现代”在西方已经死了。“后现代”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欧美的主要社会思潮。这一观点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俄罗斯托尔斯泰国家博物馆研究部主任麦迪逊（Andtey Madiseon）以“‘俄国革命的镜子’中的反映论影响：并非仅仅是列宁和托尔斯泰”为题，回应了默多克的发言。他认为：现代文化包含着两个次级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前者提炼了大众文化，后者为精英文化提供了原生态物质。现代文化的关键角色是中介、管理者和发行商。中介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所有者，这种文化状况与马克思当年的预言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距。他认为革命不需要中介，如当年托尔斯泰就拒绝领稿费。文化产品的好坏应由作者和接受者说了算，在大众中，反映论是由反映实践所决定的。世界的发展不是在一种维度上，现代性就是要回答人们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在一个时期被否定的东西也许在另一个时期可能又会被给予肯定。在谈到文学的当代性时，他认为政治家要掩盖某些社会矛盾，作家要追求揭示这些矛盾，这两者是矛盾的，作家的当代性就在于在作品中有勇气去反映当下的矛盾。至于什么是当代性，他提出用俄罗斯式的思维方式来回答：让作家和读者自己去界定。

日本神户女学院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部教授滨下昌宏则从对三位重要的思想家甘地、森和斯皮瓦克的分析入手，提出了人文学科如何能够抵制强权和有着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怎样保持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等重大文化问题。他认为甘地抵制暴力和强权政治，呼吁各文明的精神价值高于经济的成就；森把伦理带入到经济学中；斯皮瓦克则揭示出暴力的种种特征以及强权政治作风的观念，并对此进行了批判。他把他们而不是那些英国化了的知识分子，看作是真正的印度人民。他们站在底层人民一边，努力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钱中文指出，上世纪50年代引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在80年代受到了全面清算。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学者在不断清理、继承我国现代文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面向世界，探讨前沿问题，沟通中外古今，建设有我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形态。由于当今社会的急剧变化，媒体、资本共谋制造文学时尚，文学功能粗俗化，价值失范，文学理论确实严重滞后，但这并非由于什么“前苏联体系”所致。至于说文学理论已经从文化研究中取得了“后现代真经”，一派光昌流丽景象，并要我们在很长时期内学深、学透这部真经，这可能会把人文科学标准化、“麦当劳化”了。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刘奔指出，80年代，邓小平就尖锐地批评了精神生产领域一切向钱看、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现在某些部门无视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在文化领域照搬市场经济规律。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看，如果在文化市场化的口号下，使文化生产和世界市场接轨，淡化意识形态，忽视文化产品品质的方面即文化价值的实现，这不但不利于文化的发展，而且会迎合西方霸权主义文化战略的需要，危及我们的文化安全。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尤西林认为，尽管现代人拥有着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但仍受制于以缩短全球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竞争为中心的工作时间。这一格局规定着自由时间与文化的现代性困境。当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揭示了上述困境。他力图使自由时间超越剩余劳动时间地位，而独立为自由人性的现代生长基础。他所展望的以科学、艺术为典范的自由时间活动形态仍是批判现代商业消费文化的尺度。但是，这一典范形态如何返回工作时间并转化以交换价值及利润为目的的现代工作性质，却是今天与未来更为重大的难题。

上海社科院许明谈了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看法。他指出，重读马克思在当代是完全必要的，而且，重视和总结中国本土经验，特别是20世纪西风东渐以后产生的中国经验和理性总结，将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社书瀛从《共产党宣言》谈到了全球化与民族性问题。指出，由先辈得到启示，我们一方面要警惕当今世界上打着“全球化”旗号而实行经济沙文主义、政治霸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要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开放的心态欢迎和促进作为全球文化共享的真正的全球化。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黄力之认为，《共产党宣言》既是全球化的伟大预言，也是文化现代性的伟大预言。

会上，还有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复旦大学刘放桐、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徐绍刚、英国拉夫堡大学章戈培博士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当下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文化建设的矛盾和问题。研讨会充分体现了本次会议的跨学科性质。从会议代表的发言可以看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战略必须正视文化发展中的客观矛盾，理论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分析研究这些矛盾，探寻解决矛盾的现实途径。

（马驰）

责任编辑：刘奔（《哲学研究》2004年第12期）

[回主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哲学所 邮政编码：100732